

听作者说

茅奖得主谈获奖作品

宋 庄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近日尘埃落定，格非《江南三部曲》、王蒙《这边风景》、李佩甫《生命册》、金宇澄《繁花》、苏童《黄雀记》5部长篇小说夺得桂冠。本届茅盾文学奖得主获此殊荣，会有什么感受呢？

《江南三部曲》：记录当代的精神生活

有时像又密又急的秋雨滴落无边的湖面，有时像飘飘扬扬的雨丝遮掩参差的屋宇，格非的文字，带着一种淡淡的忧郁和优美的诗意，让人不由自主裹进江南小镇弥漫的雾气。从《迷舟》、《褐色鸟群》及至《欲望的旗帜》，格非所编织的故事四溢着游戏且无序的“弥天大雾”，甚至被定性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玄奥的作品”。

但是到了《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格非缓慢且从容地沉浸于语言的古典意境之中。尤其《春尽江南》的完成，“乌托邦三部曲”划上了句号，格非的写作如同绵绵春雨的间隙出现了灿烂的阳光，由虚幻走进现实批判。很多人说被作品深深地触动。“我个人的判断，希望通过《春尽江南》来表现、记录当代的精神生活，也尝试在叙事上有新的变化，使得它不要有太高的语言文字上的门槛，使得叙事更清晰一些。”格非说，原来作品中的很多迷雾，现在正慢慢拨开。

《这边风景》：79岁与39岁对话

“我找到了，我发现了：那个过往的岁月，过往的王蒙，过往的乡村和朋友。黑洞当中亮起了一盏光影错落的奇灯。”

《这边风景》是40年前的旧作，但他不想对这部旧作做过多的改动。“第一我没有这个能力，第二就会使那个时代的很多时代特色

都消失了。但是另一方面，作为新作，2012年我对它重新作了整理归纳和某些小改动，我需要有一个21世纪的态度和立场，需要给读者一个交代。”在这种情况下，“小说人语”出现了，今天的王蒙在点评40年前的写作。

1974年，在妻子的鼓励下，王蒙决心把自己远赴新疆，破釜沉舟，一杆子插到底，与农民打成一片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所想写成一部大的长篇小说。

小说写于1974~1978年，40年来一直未曾出版，直到2012年作者重新发现，2013年4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王蒙评价说，《这边风景》是自己写在盛年的一部奇怪的书，它充满了极左口号，却又具有极丰富的生活资源、文化资源，有细致入微的现实主义描写与当时的中国梦的理想，有大的规模体量，光人物表上列举的人物就有80多个，写的给人印象深刻的至少20多个。它是带着镣铐的动情之舞。它是相隔近40年后出土的一件文物，却仍然因生活的真实生动而依然活着，“我面对它是百感交集，是幸福的痛苦。并不是每一件作品都能经得住40年的考验。”

《生命册》：那片赖以生存的土地

《生命册》完成之后，李佩甫觉得，对脚下这片土地的认识的阶段性总结，自己已经尽力了。在数次采访中，李佩甫不断重复的，是寻找认知的方向，寻找自己的创作源泉，打一口属于自己的“井”。

童年的记忆已经碎片化了，却因为打小儿的浸泡，使李佩甫无比地怀念，即便那碎片化为风，也是有颜色的风，带沙味的风。这使他清楚地意识到，虽出身于工人家庭，在小城市长大，他的根，扎在平原。他写了最普通的植物，写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在这部“内省书”的创作过程中，他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指甲里开花”的感觉，痛并快

乐着。作品主人公的“我”，是一个“背负土地行走的人”，一个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知识分子。他从乡村到省城，从省城到北京，再从北京到上海，一路走来，“我”的身份也从大学老师成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药厂负责人。“我”是一个深刻、冷静、内敛、节制，不偏执，不轻狂，有着一切自省者和带有知识分子尊严的人物，所以自始至终都在默默地观察和审视着周围的一切。

对于此次获奖，他说，“我是站在中原作家崛起的新高度上，在很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获得了这个奖。因此，获奖了固然高兴；但不论能否获奖，我都会不停地写下去。”

《繁花》：让城市在笔下生动

《繁花》盛开自2012年秋季的《收获》，迅即蔓延成一片花海，覆盖了略显沉闷的文坛。至2013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有关《繁花》的话题依然有增无减。

金宇澄，这个近20年来只出现在上海文学杂志编辑栏里的名字，突然之间被屡屡提及并交口称赞——2012年中国小说学会“长篇排行榜”榜首；2012“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奖”；2013“施耐庵文学奖”……淡淡的花香飘至2015年的8月，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桂冠，也落在他的名下。

金宇澄把传统资源、方言叙事、现代精神汇聚于一炉，为小说如何讲述中国生活创造了新的典范。

其实，不止于中国生活，对于中国的城市题材，《繁花》也是一种新的拓展。“1985年我写的乡野小说，等于我是在城里，写乡下事情，乡野经验挥发期。”金宇澄说，“往远里说，城市写作被边缘化很多年，否定城市的意义，但人们却都又进入城市，它一直被评论为腐朽的温床，尤其上海，一直被批判，或给出种种简单化的定论，比如上海的历史很短，原先

只是小渔村，但我们知道，上海这几代人，都不可能是这小村子，这小渔民的子孙，不说外来影响，上海文化的构成相当复杂，等于一块压缩饼干，聚结的传统根脉，联系周边苏、杭、江南的千年历史，就等于评论美国是年轻的国家，其实看历史就知道，它包含了英法等欧洲内容的最复杂的精神元素，包含最不安分的各类人群的基因，而且文学也不是历史学，不需要千年的积淀，比如用文学写两代人，已经写不脏写了。”

《繁花》的语言特征、散点样式，轻浮与沉重的世相，都得到了读者的认同。有读者甚至说，金老师可以凭此终老了，金宇澄听了有点伤心，但他又觉得，目前确实不可能再写出第二部同类小说了，这也是他为什么反复修改的原因，“因为舍不得，我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这可能是我对小说的个人认识，繁花是自然到来的，自然的机缘，很少会再有，感谢上帝给我的机会，让它更厚实，更充分，才得对起喜欢这本书的读者。”

《黄雀记》：邮票大的地方上做道场

苏童说，很多作家都有意做一个对故事常规或形式上的破坏者。他的“破坏”更有挑战性，是因为他只在邮票大的地方做道场。他说，“香椿树街”要写一辈子，不会厌烦。

这次他“画”的邮票叫《黄雀记》，仍然是香椿树街的故事，但整个故事历史时间拉得比较长。他力图使自己的作品面目复杂，而不是做一个简单地被一两句话概括的作家，“倒不是有意树立复杂多变的形象，我的创作一直想自我调整，设计一个模糊的未来，设计所谓如何说故事。过去的讲述还没有剖析到人物的灵魂深处；《黄雀记》不同，我很努力地写到最深处，像一道光，像一把刀，切入最深的地方，不能再往前走一寸为止。”苏童说，书里的人物形象塑造之鲜明，是他写作以来最满意的，以至于能够“看见”他们。“过去我也在努力塑造人物，但没能‘看见’他们；《黄雀记》的写作，是人物离我最近的一次，每一个章节写作中的相处，我都能感觉到他们的呼吸。写到某个对话时，如果写得不妥当，人物会自动纠正我；应该这么说话。”

对于此次获得茅奖，苏童高兴之余仍不失冷静。他说，对写作者而言，一张奖状，不能决定写作的品质和方向。

听评委说

彭程：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获奖作品评委怎么看

本报记者 苏墨

记者：您怎么评价这几部获奖作品？分别介绍一下好吗？

彭程：《这边风景》描绘了新疆大地上汉、维两族人民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生活，以及两族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友爱共处，是对生活的激情讴歌。作者对少数民族的情感和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塑造了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王蒙作品机智幽默的风格，在这部写于上世纪70年代的作品中已有突出的体现。

《生命册》描绘出身乡村的知识分子在城市中的遭际和沉浮，以犀利的批判姿态，展开了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入剖析，探讨了传统与现代、生命与土地的关系，表达上既坚实饱满又诗意弥漫。《江南三部曲》的背景跨度长达一个世纪，描绘了几代知识分子的灵魂状态、精神世界的嬗变，在社会风云的变幻中探讨了人和时代的相互作用，文体上保持了格非一贯的优雅和从容。《繁花》妖娆、琐细而精致，用精短的方言对白，写出了上海的人、事、城的独特的韵味和情调，刻画了庸常生活中的万千形态和无穷滋味。《黄雀记》仍然以作者作品中多次出现的南方城市的香椿街为背景，写了小地方中的小人物，写出了少年青春的残酷、市井生活的百态，涉及了罪与罚、沉沦与拯救等命题。湿润的语感、奇诡的想象、丰富的隐喻，在舒缓细腻的叙述中慢慢展开。

记者：很多人说，此次茅奖更像是奖给作家而非作品，您怎么看？

彭程：根据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茅奖是



“褒奖体现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思想高度和艺术水准的优秀作品”。说得很明确，是评作品。因此评奖首先看重的是作品本身。一部作品如果的确足够优秀，有着鲜明卓异的艺术特质和审美风格，是不会被漠视的。这次《繁花》的高票获奖，充分印证了这点。作者金宇澄是一位文学编辑，作为作家此前并不广为人知。

但另一方面，作品是作家写出来的，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文学创作是一个漫长的、不断进步的过程，一个作家写出好作品，往往都是经过多年的积累的，在这个修炼的过程中本身也成了知名的作家。因此这次茅奖评比和往届一样，大多数获奖作品的作者也是著名作家。王蒙、格非、李佩甫、苏童，每个人都是如此。因此，我相信“好作家、好作品”会是几十位评委在评选中普遍遵循的一个尺度。一位优秀作家，因为写出了优秀作品，而最终获得了茅奖——我想这样描述二者的关系，可能比较准确。

记者：提名作品中您还有哪部推荐？

彭程：因为整个评选过程是公正、严格的，因此这次获得提名奖的10部作品，我认为都是这四年中堪称优秀的作品，思想性、艺术性上各有千秋。但茅奖评选最多只能推出5部，必须舍弃另外五部，因此评委们要在这个规则下进行一些必要的妥协，更多地凝聚共识。并不是说未能获奖的几部，就一定比获奖的差很多，赶到最后的环节，作为评委越感到取舍之间的犹豫和纠结。

即便是未能进入10个提名行列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是很不错的，如刘庆邦的《黄泥地》、宁肯的《三个三重奏》、严歌苓的《陆犯焉识》等等，我都很喜欢。

听说，这届茅奖作品都很好看

听读者说



“回应”传统文化

陈俊宇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分别是：《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

美国马里兰大学亚洲与东欧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刘剑梅说，《江南三部曲》是有历史有当下，前两部是历史，而且格非主要是对中国乌托邦的实践做了一个反思。《人面桃花》从晚清乌托邦开始反思，到了《山河入梦》是革命时期和新中国以后的乌托邦反思。所有的反思都指向灾难，而灾难的最大原因就是集体的乌托邦，思想统一化，不重视个人的权利和尊严，不能容纳差异性的思想。然后到了《春尽江南》开始写当下，在里头看到了一些庄子的东西，做一个无用者才能不被所用。

书中的故事和人物都取材于江南腹地，对格非而言，“江南”不仅仅是地理名称，还是一个历史和文化概念。

“我对大的时代没有太大的兴趣，大不了是一个历史的框架，我感兴趣的是人，而且不是一般的人，是那些在时代变化当中被卷入进去的人，或者是一些不幸的人，他们不能应付生活，缺乏自信，比较脆弱。”格非的这番话，在《江南三部曲》的封面得到印证，“再现剧变时代个体的梦想与挣扎，选择与无奈”。

创作三部曲始源1994年。到《人面桃花》动笔，已经是2003年初春。再到2007年《山河入梦》出版，又过了5年，《春尽江南》才姗姗而来。

1994年前后，是格非一度中断写作的开始，时间长达近10年。在此之前的1987年，他发表成名作《迷舟》，从此以“叙述空缺”而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

然而，“80年代结束了，90年代开始”，中国的市场化非常快速地膨胀，很多的中国作家都不能适应，需要重新寻找自己，我也不例外，格非坦然缺少写作的动力，有新旧世纪交替的迷茫，也有伤感，太过迅速的变化，有些价值和信念的摧毁，让他还不习惯。

格非的重新露面，就是江南三部曲之《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风格早已褪去“先锋”色彩。那鲜有作品的十年，格非在“补课”，从现代主义到传统文学、古典美学的回归。因此他说，《江南三部曲》不是“撤退”，也不是“突破”，而是“回应”传统文化。在《春尽江南》的结尾，作者写道，“在当代时代，只有简单、朴素的心灵才是符合道德的。”一切如是，于是读之。

清蒸鱼中段独好

吴 迪

喜欢作家王蒙的人都知道，他有一段“清蒸鱼中段”的说法。他在后记里提到“重读旧稿、悲从中来”，心情复杂。笑称在这部小说中找到了38岁到47岁的自己，就好比一条清蒸鱼找到了自己的中段。

他的人生经历颇具时代典型特征。年轻时是不幸的，处在反右、文革的大背景中，因作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发配边疆”。但他又是幸运的，在新疆与边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点滴生活融入新疆少数民族的生活中，为该小说的创作铸造了血肉灵魂。当他重新回到我们视野，由于《这边风景》书稿的存在，“我找到了我的38岁到47岁，找到了我们的20世纪60年代”，也弥补了他创作生涯中缺失的16年。

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将那段颇具时代烙印的特定年代呈现在我们面前，细细品来，拍案叫绝的同时慨然长思，那恁是“清蒸”——时代与人物，鲜活血肉，分明是有滋有味的“红烧”。

这本书写于1974年至1978年，是王蒙在新疆“流放”期间创作的。作品以新疆伊犁地区为场景，围绕公粮被盗和伊犁事件，描写那个时代别具特色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

虽然不可避免地含有以阶级斗争为故事情节的政治意识，但仍然散发出浓郁的日常生活韵味。例如小说中描绘：1951年搞土改，乌尔汗家的日子逐渐好了起来。她和几个女孩子演唱“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杜鲁门笑哈哈！”受到观众热烈鼓掌。可惜，这种轻松的幸福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毛主席说了，小农经济是没有前途的。果然，乌尔汗一家的日子又逐渐窘迫。父母念叨着女儿大了，家里没有钱，要把女儿嫁出去。于是，乌尔汗结了婚，丈夫伊萨木冬，比她大13岁。丈夫喜欢结交“知识分子”，成为小有名气的管委会委员，逐渐接受和习惯了别人的阿谀奉承，并开始放荡、挥霍和贪污受贿，甚至开始吸毒。她的苦劝让丈夫如梦初醒，“我真恨那些狐朋狗友……”

最平凡的生活本身成为这部作品的灵魂，“即使在政策偏颇、民生艰难的岁月，生活仍然是强健的、丰富多彩的、美妙非凡的。不妥的政策会扭曲生活，而劳动人民的真实与热烈的生活，却完全可以消解假大空‘左’的荒唐”。政治的坚硬无情毁灭不了生活，老百姓的现实逻辑终究会透过政治的缝隙释放出来。僵化的教条无法覆盖活泼的生机，正所谓“风景这边独好”，在那个严酷的时代仍然无法遮掩住。

探寻时代与精神的关联

齐 峻

李佩甫在《生命册》的扉页上写了泰戈尔一句话：“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门，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在这本约38万字的小小说里，李佩甫力图展现的是一个时代与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关联。

书中的“我”是从乡村走入省城的大学教师，想完全脱离家乡无梁村的喜怒哀乐，却发现自己无处可逃，来自乡亲们的请求让“我”心力交瘁，更因无力帮助他们而羞愧。于是，“我”跟着大学同学“骆驼”下海。不同的是，“骆驼”在城市追逐欲望和贪婪的声浪里迷失了；而“我”一直坚守道德底线，以致没有完全迷失。尽管彻底摆脱农村的想法始终盘旋在“我”的脑海，但在生“我”养“我”的无梁村，始终有“我”挥之不去的记忆。

《生命册》中还塑造了其他几个无梁村的人物：深陷家庭矛盾不能自拔的老丈父；无休止上访的梁五方；为拉扯三个孩子而沦为小偷的虫嫂；在乡人的闲言碎语中自宫的能手泰才……

对于这些人物，作者有批判，更有人性的关怀。而对对待这些人物的态度，实则也映射出李佩甫对新旧杂陈的乡村社会的态度：他不仅延续了乡土文学中批判和改造国民性的传统，又杂糅了类似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作家作品中皈依乡土的情感诉求。

人们习惯于将李佩甫归结为乡土作家，从《羊的门》《城的灯》《等等灵魂》到今天的《生命册》，乡土题材确实也一直是李佩甫钟爱且擅长的类型。但是《生命册》又有所不同，该书以全面、多元的视角关注那个飞速发展时期的各种历史真实，并以乡村作为城市的背景，描述了新“城市人”在大都市艰难坎坷的心路历程；同时以一个“城市人”的角度，珍视着来自乡村的原始人性。借助“我”和“骆驼”之眼，城市商海的浮华也如浮世绘一般展现在人们面前。

《生命册》中的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如此矛盾而又不可分离：“我”在追逐城市现代文明的同时，却始终难以割断与无梁村的血脉联系。在“官场”和“商场”中变异的人性，又给村民带来原始乡土的对照。

李佩甫继承了乡土叙事中关照现实的传统，但这也并没有妨碍他对乡土叙事的超越。乡村与城市生活的双重体验，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双重的影响，在书中都能窥得一斑。正如书中的“我”难以割舍的乡村记忆一样，作者试图给浮华的城市及喧嚣的时代寻找一个根植大地和农业文明的精神家园。

繁花开落道尽悲喜

沙 洲

“这天下午，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场，听见有人招呼，沪生一看，是陶陶，前女朋友梅琳的邻居。沪生说，陶陶卖大闸蟹了。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

这是《繁花》的开头。用作者金宇澄的话来讲，“小说的开头，等于出门赴一个重要约会，会郑重考虑穿什么，不是马马虎虎就可以出门的”。

开篇上来就是一番说书人竭力要拉住人听书的场景——作者郑重地邀大家进来看风景，《繁花》里有什么风景可看？

《繁花》如其书名，在20世纪60年代、90年代两个时空线索上，行走着100多个人物，铺陈无数悲喜故事，人多景杂，繁花静叶声色哗妙，还原了近半个世纪上海的生活地图和人情世故。出身于军人家庭的沪生长大了做律师、资本家家庭的阿宝长大先做工人再做贸易、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小毛长大继续做工人，这三个背景不同的上海男人串起了数百人物，40余年的云波诡谲。

与人们传统印象中海派小说多传奇故事不同的是，30多万字的《繁花》对准的是平凡人物的生活庸常，所谓故事不过是时代的边角料，却经过现代意义的提炼，作者试图在饮食男女鸡鸣狗碎的琐事中，发现生活的真相，触摸上海这所城市的内在纹路。为人津津乐道的是，《繁花》传播的过程颇具传奇色彩。2012年秋天，籍籍无名的小小说编辑金宇澄，化名“独上阁楼”，在研究上海本地文化的弄堂网文学板块“弄堂网”上每天写上一段，意外受到如潮喝彩，而后登上《收获》，出版单行本。3年来，这本小小说几乎拿遍了国内各种文学大奖，最近更是不负众望地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可以说，《繁花》有了现在的关注度，是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合力的结果。

《繁花》有种笃悠悠、徜徉洋、漫不经心的调子，同时又能见作者的雄心勃勃。另一个重要特点则是以传统话本的方式谋篇，整部小说几乎全由闲谈、闲聊和对话组成，句读分隔多用短句，简单标点，句子短而细碎，少铺陈，干净利落，趣味盎然。

《繁花》前言写古罗马诗人有言，“不哀则不能使人欢笑”，但整本书写少年，成长，追求，爱情，算计，倾轧，欲望，幻灭，死亡，凡此种种，写的都是极寻常的事，讲的有荤有素，底子上是悲哀。《繁花》并非想象之华，却有回味无穷之味。习惯浅阅读、轻量化阅读的人们，不妨走进去，体味这繁花开落的悲喜，感受“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语”之妙。

